

华夏天竺 兼爱尚同

——关于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

季羨林¹, 郁龙余²

(1.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2. 深圳大学留学生部, 广东 深圳 518060)

编者按: 本文是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和我校郁龙余教授为《梵典与华章: 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一书以“对话”方式所作的卷首语。季先生虽已94高龄, 而且住院疗养, 但仍思维敏捷, 笔耕不止, 每日可写2000字。在这篇《对话》中, 他重申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观点, 还提出了许多新的真知灼见。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当代思想学术重镇的堂正和深厚。本刊征得作者同意, 予以全文刊出, 以飨广大读者。

关键词: 印度; 中印文化; 华夏

中图分类号: G 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04)04-0005-04

郁: 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主编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得到了您的大力支持。《丛书》的前6种出版后, 读者反映热烈, 不少读者认为《丛书》中不能缺少印度卷《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 所以主编和出版社将《丛书》规模从8种扩大为10种, 其中包括印度卷, 书名为《梵典与华章》, 讲中印文化互相的交流与影响。季先生, 您以为如何?

季: 钱林森教授主编的这套《丛书》, 我是非常支持的。一是因为这套书本身意义重大, 前几种出版之后大受读者欢迎, 是预料中事; 二是对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支持, 我年老体弱, 不能到西部去支教、种树, 但可以用其他办法来帮助他们, 譬如说支持出好这套丛书。他们也很重视, 是“十五”国家重点图书。《丛书》原来计划出8种, 现在又扩大为10种, 这很好, 我完全赞成。不管出8种还是10种, 印度卷是不能缺的, 因为中印文学关联太密切, 缺了就说不过去。不过, 写印度卷有相当难度。这个你也知道。原因主要是印度人不重视记录, 他们的可用史料寥寥

无几。我一直反对中印文化交流单向论, 但由于印度史料的缺乏, 造成中印文化关系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化在印度传播和影响研究的困难。希望你们这次有所突破。

郁: 在新资料方面, 我们注意了, 也努力了, 但仍不能满意。

鲁迅说过: “印度则交通自古, 贻我大祥, 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赐, 虽兄弟眷属, 何以加之。”^[1]您一辈子研究印度文化, 深知中印文化关系的广度与深度。对鲁迅的这一段话的理解一定更加深切, 能请您具体谈谈么?

季: 鲁迅骨头很硬, 做学问很严谨, 从不说过头的话。他对印度文化评价十分之高。在《痴华题记》中说: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 如大林深泉, 他国艺文, 往往蒙其影响。”这些评价都是他对印度文学作了研究之后才说的, 有真切的感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多少年前写的, 现在读起来还是觉得那么深刻、精辟。为什么? 是因为

收稿日期: 2004-06-09

作者简介: 季羨林(1911—), 男, 山东临清人, 北京大学教授, 著名印度学家、东方学家、文化交流史专家, 《跨文化丛书》学术顾问。郁龙余(1946—), 男, 上海人, 深圳大学教授, 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研究得透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行呢!关于印度文化,鲁迅的话不是很多,但都深得要领。鲁迅思想深刻,这和他研究印度文化有关系。有人注意到他 1914 年所购 161 种书籍中,佛学著作达 89 种,占他全年购书的 55% 以上。鲁迅著作里常有佛教词汇,他做过一首诗《题三义塔》,最后两句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中有佛语,但他始终是个为民请命的斗士。

郁:印度的两大史诗不但是印度的文学瑰宝,也是全人类的文学财富。在文革中,您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其中的《罗摩衍那》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国当代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事。请问当时是什么动力支撑您完成这项工作的呢?在《“罗摩衍那”初探》一书中,您谈了当时对这部史诗的认识,时至今日,您对这部史诗有了什么新的看法么?

季:关于翻译研究《罗摩衍那》这个问题,我以前说得很多了。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点,看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有一个重要标志,看它的文化学术;一个国家的文化学术昌盛不昌盛,除了看它自己的文化学术宝库是否充盈,是否瑰丽,还要看它对世界优秀文化了解不了解,研究得怎么样。这个标志,很灵验。当年欧洲各国实力强大,对东方学研究水平很高,出了一大批东方学家,有研究中国的、印度的、埃及的、两河流域的。现在怎么样,没有那种势头了。我们中国怎么办?我看完全可以接过来,把东方文化研究搞上去,搞出一个新的水平来。

郁:您对印度的戏剧好像特别感兴趣,亲自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晚年还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将《弥勒会见记》翻译成英文出版,能请您谈谈其中的原因么?为什么您对印度戏剧如此着迷?

季:印度戏剧在印度文化史上有特别的地位,所以我一直比较关注。我们中国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重视文字记录。一部二十四史,皇皇巨著,哪个国家有?不过我们也有一个缺点,历史研究对其他非文字的资料注意不够。戏剧的好处就很多,除了文字之外,还有演员、歌舞、道具、审美时尚,等等。把一个戏剧研究好了,就像时光倒转,回到了当时的场景,把历史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我看重文字,但也不忽视其他非文字的资料。美国有个学者叫梅维恒(Victor H. Mair),是研究中国和印度的,写了本《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

印度起源》。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有许多见解很新鲜,注意到了绘画、表演和中印文化的关系,很有学术性,就请邦维他们几个翻译成中文,后来出版了。

译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花去了不少时间。开始是盛情难却,外国学者要求,我不好推辞。后来是骑虎难下,一动手没想到这么费事,但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能抓紧时间搞。有一年寒假,你请我去深圳避寒,我没能答应,正在忙这个剧本呢。不过,总算完成了。现在想想,虽然花的时间多了点,但还是值得的。

郁:德国学者提出了文学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概念——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而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与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有关,您认为这是偶然的吗?

季:世界上的事有时候很巧,也就是说有偶然性。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这两个概念,最早都是德国人提出来的,而且和中国、印度有关。1827 年 1 月 31 日,歌德和爱克曼谈话,后来由爱克曼整理成有名的《歌德谈话录》。谈话是在歌德看了中国作品之后展开的。歌德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不过歌德没有给它具体下定义。歌德谈话前,到底读了什么中国作品,人们有不同意见,陈铨、朱光潜认为是《好逑传》,也有人认为是《花笺记》而不是《好逑传》。我比较倾向于《好逑传》,因为谈话中讲到一对青年男女共处一室而不乱,应该是《好逑传》第七回中的内容。不管读的是哪一部,反正是中国作品引出了歌德“世界文学”的概念,这是肯定的。

关于比较文学,德国人一般称作比较文学史(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创始人是本发伊(Theodor Benfey)。1859 年,他在《五卷书》德译本的长篇导言中,以惊人的博学多识,探讨了《五卷书》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演变,从而奠定了比较文学史的基础。

如果说“世界文学”、“比较文学”这两个概念都由德国人提出来有点偶然性的话,那么它们的产生与中国、印度作品有关,应该说有其必然性。离开了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谈不好世界文学和比较文

学。这说明歌德和本发伊确实是有眼光的。

郁：泰戈尔是中印现代文化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您13岁时在济南见过他，中学时代读他的诗，后来又成了泰戈尔的介绍者和研究者，许多人对泰戈尔的评价来自您的文章。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我想请您谈谈泰戈尔在印度文化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和成就。

季：关于泰戈尔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做过一些研究，不过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泰戈尔这个人天分、勤勉加长寿，非常难得。我看他既是一个“拿来主义者”，又是一个“送去主义者”，所以他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留得下名。拿来主义，说明他对外国文化态度开放，不封闭，善于消化、吸收。送去主义，说明他自信，有奉献精神，有东西送出去。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社会的发展，需要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不需要关门思想和贾桂思想。泰戈尔对“拿来”和“送去”的关系处理得好，所以在印度文化现代转型中，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是印度现代文化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郁：您作为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研究领域广泛，但印度语言和文化是您的专业，您毕生都在为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而努力，请您谈谈对中印文化交流的看法，以及对其前景的展望。

季：不要说著名不著名，咱们有事说事。

关于中印文化交流，许多有见地的学者都很重视。比如梁启超，他在许多文章里都提到这个问题，认为佛教东传，对中国文化带来了许多影响。有人将其归纳为五大项：(1)国语实质的扩大；(2)语法及文体的变化；(3)文学情趣的发展；(4)歌舞剧的传入；(5)字母的仿造。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归纳为三大贡献：第一，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第二，中国浪漫主义的文学（指《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的产儿；第三，对中国文学体裁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梁启超的“五项影响”说还是胡适的“三大贡献”说，都说明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成果累累，堪称跨文化交流的楷模。

关于中印文化关系，我积累了大量资料，不止稿积盈尺，也曾写过不少文章，出了一本《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后来又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写了

一本《中印文化交流史》，因为只有12万字篇幅，像戴着枷锁跳舞，不能有大动作，只能大题小做。其实，我的其他著作，如《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东西文化议论集》等等，也都大量涉及中印文化交流的内容。我一直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了却我一生的心愿。只要身体允许，我会尽力去做。不过，研究中印文化关系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参加进来。

我认为，可以先从资料工作做起。我一直主张收集资料要彻底，要竭泽而渔，只有做到这样，心里才有底气。一下子把中印文化关系的资料全部搞齐，谈何容易，可以分门别类搞，饭一口一口吃。最近有一本书，名叫《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皇皇900页巨著，我想一定是把汉译佛典中的音乐资料，做了穷尽性收集整理。下这种死工夫是值得的。我们不是提倡“送去主义”吗？送什么去，除了理论、观点之外，还应包括资料。我看这部音乐史料外国同好一定需要。除了音乐，绘画、戏剧、建筑、雕塑、文学、语言等等，也都需要人去收集整理。佛典之外，道藏、儒藏（编纂工程已启动）各类史籍、笔记、游记等等，都有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我以前讲过，我们中国人并不完全了解自己，通过这类资料整理，可以帮助我们摸清文化的家底，慢慢地完全了解自己。

郁：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出现过一个个西天取经的故事，其中以唐玄奘最为著名。不畏艰险，求取真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当今的地球村时代，您认为这种取经精神还有意义吗？应该如何发扬这种精神呢？

季：唐僧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也流传很广。取经精神，在过去非常重要，今天依然非常重要。玄奘是舍身求法的典型，他翻译的佛经、开创的译风以及《大唐西域记》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和一些同志曾花了好几年时间对《大唐西域记》进行校注。等到工作完成，却没有了结的感觉，反倒感到方才开始。我们这个民族灾难太多，耽误的时间太多，有许多事情要赶着做。现在到了所谓的“地球村时代”，我们应该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地球村时代，取经精神变得更加重要。什么是取经精神？我看就是不畏艰险，学取知识，敢于攀登真理高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竞争更加激烈，国与国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借鉴，变得比什么时

候都迫切。我们不但要坚持取经精神,而且要大大发扬。感谢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份财富不能在我们手上丢失,而要永远传下去。取经精神,是一个民族保持文化之树常青,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我们有了这个法宝,所以中华民族历尽艰难而不衰。现在,我们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发扬取经精神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与时俱进、做得更好的问题。

郁:中印几千年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果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并变成了中国佛教。这种情形正如玄奘所说:“佛兴西方,法流东国。”中华民族这种吸纳外国文化的宏伟气魄是令人惊叹的,也是我们后代子孙应该发扬光大的。当今,我们正面临着全球化的浪潮,西方文化的影响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您能否联系历史与现实,谈谈我们的应对之策?

季:一部中外文化关系史,大的文化交流有两次,一次是从汉朝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得益匪浅;一次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我相信这次我们得益会更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会在这次文化大交流中走向世界前列。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化不等于全球化,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现在有的人是把它们混淆起来的,很不科学。我赞同

国际化,国际化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什么是国际化呢,就是要知道世界动向,把自己的事做好,做成国际一流。当年的玄奘,把他的工作做得很漂亮,世界水平,就是国际化;当年的沈括把科研做得很好,李约瑟大为称赞,这就是世界水平,国际化。现在有些人,不肯下功夫做,动不动喊国际接轨,什么是国际之轨,轨在哪里?不知道又怎么能接轨!

目前,西方文化的影响深入到我们的各个领域,铺天盖地,我看总体上讲是好事。当年佛教传到中国,一浪高过一浪,多少人出家,多少人烧香,最后怎么样?好的、有用的东西留下来了,落后的、迷信的东西淘汰了。西方文化也一样,通过中西交流,好的、先进的东西会留下,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那些落后、腐朽的东西一定会被淘汰掉。要相信中华民族的识别能力,要相信中国文化的自净能力。总的来说,还是那句老话:道路曲折,前景光明。

参考文献:

- [1]鲁迅. 破恶声记[A]. 鲁迅全集 第八卷 集外集拾遗补编 [C].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3.

【责任编辑:陈红】

A Dialogu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n Writers and Chinese Cultures

JI Xian-lin¹, YU Long-yu²

(1. Beijing Univ. Beijing 100871; 2. Dept. of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Shenzhen Univ., Shenzhen 518060, P. R. China)

Editorial Note: The present article is written by Prof. JI Xian-lin, a nationally-known scholar of China and Prof. YU Long-yu of our Shenzhen University in the form of a dialogue for the book *Classics: Sanskrit and Chinese—Indian Writers and Chinese Cultures*. Prof. JI, though already 94 years of age and currently recuperating in hospital, is still very quick-minded and keeps writing so diligently that he produces 2000 characters every day. In this dialogue, he reiterates some of his basic viewpoints and puts forward many new ideas of profound insight so that we can once again sense the grandeur and depth of this contemporary scholar of great distinction. After obtaining the agreement of the authors, our journal has put to press this article in full for the benefit of broad masses of readers.

Key words: India; Chinese and Indian Cultures; China